

「美」
魏斐德
著

Frederic Wakeman, Jr.

陈苏镇
薄小莹
等译

洪业

The Great
Enterprise

清朝
开国史

〔增订版〕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洪业

The Great Enterprise

「美」
魏斐德
著

陈苏镇
薄小莹
等译

清朝
开国史

〔增订版〕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洪业：清朝开国史 / (美) 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Jr.) 著；陈苏镇，薄小莹等译.

— 2 版. —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2

ISBN 978-7-5133-2380-2

I. ①洪… II. ①魏… ②陈… ③薄…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清代 IV. ①K249.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85043 号

洪业：清朝开国史

(美) 魏斐德 著；陈苏镇 薄小莹 等译

出版统筹：刘丽华 向珂

特约编辑：徐圣洁

责任编辑：汪欣

责任印制：李珊珊

封面设计：一千遍工作室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010-88310888

传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60mm × 970mm 1/16

印张：55

字数：890千字

版次：2017年2月第二版 2017年2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33-2380-2

定价：118.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编者说明

《洪业：清朝开国史》（以下简称《洪业》）由被誉为“美国汉学三杰”之一的著名历史学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 1937—2006）所著。本书讲述了中国王朝史中极具戏剧性的历史阶段——1644年明王朝的落幕及后续20年清王朝的巩固。作者对一个帝国如何陷入困境、另一个帝国又如何重建秩序走向强盛的过程，进行了总体解剖与透视。

《洪业》于1985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首次出版，且于1987年获得了美国亚洲研究协会颁发的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之后，此书在魏斐德的中国好友庞朴的建议下，被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陈苏镇、薄小莹等译成中文。魏斐德全球化的研究视野与娓娓动听的叙事能力促使《洪业》出版30年以来仍吸引广大中外读者。费正清在《纽约书评》上高度评价《洪业》：“对于任何对中国真正感兴趣的人来说，从现在开始，魏斐德的书是他首先要读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本书在《洪业》中文版已有版本的基础上进行重新修订，订正若干

讹误，并增加了序言、插图和代后记。序言由北京外语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李雪涛教授拨冗撰写。代后记《远航》（1993年）是魏斐德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时发表的演说稿。这些图文或许能更好地帮助中国读者了解并感知魏斐德进行中国历史研究的“志业”与他笔下伟大的“洪业”。

此次出版《洪业：清朝开国史》增订版之际，正值魏斐德先生诞辰八十周年，我们谨以此寄托对这杰出历史学家的怀念。在此，特别感谢魏斐德先生的夫人、旅美著名翻译家梁禾女士，她为我们再次提供了魏斐德先生的部分一手资料。

编者

2017年1月

增订版序：全球史视野下的明清嬗变

魏斐德的问题意识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洪业：清朝开国史》（以下简称《洪业》）的英文原书是美国著名中国历史学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 1937—2006）教授于1985年出版的一部两卷本有关中国明清嬗变过程的巨著，¹摆在读者面前的一卷本的中文版译自这一版本。

17世纪的危机在现代欧洲发展过程中具有深远的意义，是欧洲近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很多在欧洲之内研究的比较议题的焦点。²魏斐德之所以选择这一段历史进行研究，在于他认为：“1644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³而史景迁（Jonathan Spence, 1936—）也认为：“明清过渡期及清朝对魏斐德来说是理想的研究阶段。”⁴

魏斐德在此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亦即清初的制度模式如何以其制度性的控制和财政政策迅速摆脱了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却没有像欧洲一样进行深远的政治与经济的彻底转型。清初的满族统治者在汉族士大夫的协助下成功地克服了17世纪的危机，但也留下问题和隐患，使得中国无法抵御鸦片战争以来的欧洲列强的侵略，最终导致了帝国的灭亡。也就是说，如果要理解晚清乃至民国的中国社会，就要

从明清的嬗变中寻找原因。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 1923—2010）认为，17 世纪的历史危机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和作用之旷日持久，一直波及到当代。⁵他指出：

魏斐德的分析指向了一个在比较社会——历史研究中即世界史研究中最迷人的问题，即制度模式与其大环境，特别是国际环境中的关系。制度对一个环境的适应性，很可能在另一个环境里，这种适应性就是障碍。这个问题并非局限在中国，比如，对于分析西班牙帝国或威尼斯的衰败也是至关重要的，但却没有人能够像魏斐德分析明、清中国那样清晰地呈现给大家。⁶

正如艾森斯塔特所指出的那样，魏斐德的问题意识并非一个本质主义的中国经验，而是“在分析社会秩序所包含的种种具体方面的基础上，用明朝代的特殊经历，来透析中国社会”⁷而已。

魏斐德之所以选择明清的嬗变作为他的研究对象，实际上与美国当时的中国历史研究状况有关。曾作为魏斐德的弟子之一的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 1942—）教授在一次访谈中谈到了这一问题：

如果你研究一下早期的美国中国学作品，你就会发现，清朝仅仅被当作一个循环往复的朝代而已，大清王朝满族的特性并没有得到美国中国学界的足够重视。大清王朝——一个由满族人建立起来的王朝，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它与明朝有哪些不同之处？满族的特性是什么？满族的特性和儒家的理念是如何体现在满清的国家制度中的？满清政府运用何种独特的手段缓解了满汉冲突、使得满汉得到了调和？满清王朝特有的机构如“军机处”和王朝等级制度、政治制度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经过他十多年的探索和研究，才有了后来《洪业》这样的著作。⁸

也就是说，满族征服了中原之后，中国历史是连续的还是断裂了的？清朝的历史与明代历史延续性的问题，是魏斐德思考的中心。他并不认为，清朝是满人征服汉人的历史，而是满汉调和与重建的历史，而在这其中他特别重视的是明清嬗替过程中的连贯性问题。清初满族统治者的精明之处在于成功地继承了儒家的文化并运用了这些观念，才找到了满汉调和的支点。降清的汉族官员和清初的统治者们在维护儒家的道统方面，形成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无论什么民族都应当忠于儒家的观念——这些教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保卫了儒家思想也就得到了身份认同。⁹而这一切都发生在17世纪的明清交替的阶段。

在《洪业》中，魏斐德希望通过清初对中华帝国秩序的重建来呈现的“洪业”（the great enterprise），昭示在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势力到来之前，中国社会就已经发生了一系列的重要变化。因此他特别认同白乐日（Etienne Balázs, 1905—1963）的观点，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并非鸦片战争，而是17世纪：

白乐日将“中国近代”的起点从鸦片战争向前推到了17世纪。在第一场演讲的开篇，白乐日就单刀直入地强调“近代中国的物质与精神之根源从17世纪寻找”。他指出，该领域的学者对那个历史阶段的了解有着很大的“空白”，他们“没有意识到那一时代对中国及整个东亚产生的极其巨大的影响”。¹⁰

白乐日认为，这一时代解放的根源来自经济，而早期中华帝国黄金世纪的一些社会特征包括：1. 财政体制的货币化；2. 新的小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3. 贫穷之间、发达地区与穷乡僻壤之间的两极化；以及市民中出现了新团体，新的文学形式——小说的出现等等。¹¹魏斐德在《洪业》中在论及到17世纪江南的农业生产时，也特别强调了当时特有的发展模式：

在中晚明时期，农业的商业化，相应伴随着一种复杂动荡的社会状态的出现。在经济上，随着地主和佃户将维持生计的谷物收成改为植棉、养鱼和桔园、桑园的经营与茶的种植，新的农业形式在江南开始了。新的农业管理技术发展了，常常需要使用雇工或是有人身依附性质的劳动力。这种管理农业的新形式要求更多的资本投资，特别是用于灌溉，并且日益集中在管理地主手中。¹²

实际上，明中晚期的江南已经相当富裕，一些人的活动已经渐渐从传统的农业转到了商业上来。这一地区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极具经济活力，相当繁荣。到了明代末期，江南的商业活动就更加发达了：

到晚明末期，江南开始向北方输出棉布以换取那里的原棉。松江这样的重要的棉花中心，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来自湖广、两广和江西的长途贩运商人——他们很多雇用保镖护送，每年都要买卖价值成千上万银两的标布（最高级的棉织布）。他们及其同行在苏州丝质市场上贩卖的这种棉布遍及中国，并创造了新的消费习惯和穿着要求，也使得棉布商人们大发横财。¹³

在第八章中，魏斐德通过“江南地区的经济分化”、“社会依附关系”、“阶级矛盾”等几个方面，对江南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分化的情况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实际上，在他看来，中国和欧洲的道路选择并没有所谓正确错误之分。魏斐德明确反对沃伦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1930—）的世界体系论（World-systems theory）的观点，认为不能以此类的观点来研究中国历史，因为沃伦斯坦将“16、17世纪的欧洲历史当作世界性的模式，以欧洲为核心，认为这个核心的发展是世界文明的基础”。¹⁴ 魏斐德指出：“问题不在于中国为什么没有像欧洲一样出现

工业化，而在于为什么欧洲与中国等大多数国家不同，出现了工业革命。这才是应该解决的问题。”¹⁵17世纪的欧洲社会在各个方面显然都没有超过中国的优势，只不过由于偶然的机遇推动了后来的工业化，因此欧洲工业化和欧洲的兴起是偶然机遇带来的意外结果，根本不是由于其内部具有某种优越性造成的。

加州学派的另一位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meranz, 1958—）在他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的中文版序言中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尽管诸如‘为什么英格兰没有变成江南’之类听起来古怪的问题无疑并不比人们更为习惯的‘为什么江南没有变成英格兰’天生更高明，但它们也并不更低劣，它们还具有重要的优势……”¹⁶实际上，这样一个问题意识，显然就超越了所谓“西方国家的崛起”和“其余地区停滞”的先入为主的二元对立的观念。因为如果以欧洲为世界体系的中心的话，就无法理解16世纪的全球性关联。

对朝代更替过程中士大夫身份认同问题的考察

魏斐德的这部著作是想通过明清之变的叙事来阐述其历史见解的，明清之变其实只是他解决问题的载体。史景迁认为，正是这一段变革的时期，才能够演绎诸多戏剧性的故事：“在微观上讲，此阶段充满了栩栩如生的令人痛心的人生戏剧，其中既有发生在宫廷和战场上的，也有发生在家族、农村和市井中的。在那乱世之中，人们追求着生存之道。”¹⁷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阶段之一。魏斐德所处理的尽管是明清之际的中国的史料，但《洪业》的主要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对中国历史的独特性有所说明，更重要的是对朝代更替的过程中知识分子

身份认同问题的考察。而后者对于历史撰述来讲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身份问题”在具体的明清之变中是“忠”的问题：

这个悲剧性的道德观念是一切行动的基点。忠到底是什么？它作为实际生活的准则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对于归顺清朝的明朝旧臣洪承畴，或者明朝时在扬州被围困及后来的屠杀中丧生的史可法那样的老忠臣，对他们为忠而造成的不及预料的后果，又如何看待？与其像一位哲学教授从本体论的角度讨论宋朝程朱理学那样，干巴巴地用事不关己的态度来谈论忠在道德上的暧昧或者切身利益与自我认同之间的冲突，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决定去写满汉各方坚持以某种方式献身于忠的男女们。我尽量将这些“具体现象”置于相应的时代背景当中，从而导致了一种叙事形式，它使剧情从华中延伸到东北边远地区，交替出现于各个篇章，直至最终汇于北方首都，直至另一代忠臣的奋斗在南方呈现。¹⁸

“忠”——身份问题的体现是一个个鲜活生命的例子。这些栩栩如活的“忠臣”或“贰臣”们的一举一动仿佛跃然纸上，魏斐德以其高超的叙事方式，将这些在情节上充满着意外的故事，实现在时代背景中的“自身置入”（Sichversetzen）。¹⁹

通过“自身置入”可以看到这些明朝遗民在明清之变中的困惑、愤懑、不安、痛苦，以及所谓“贰臣”们的矛盾、焦虑、自责、纠结，这些都通过不同的事例而被魏斐德刻画得淋漓尽致、细致入微。死亡对于很多大明的臣民来讲，是忠诚于明室最好的明证：“表达这种忠诚，并在同时解决社会利益和个人信仰之间的这种冲突，一个办法就是献出一个人的生命。”²⁰

“我在读明清过渡时期的移民与贰臣传记时，一再发现中国历史学

家不断地要在对儒家的褒贬问题上苦心孤诣。”²¹ 因此，所谓的忠的问题，不仅仅是历史人物的立场，也包括后世的历史学家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评价。

满族政权占领南京后，清统治者采取了在北方已经确定的政策，一开始是所有军士，后来扩展到所有汉人都必须遵从满人的风俗，剃去他们前额的头发，将他们的头发按照满人的辫式编扎起来。²² 汉族知识分子将剃发看作是一种野蛮的行为，一种对文明的亵渎。而且对于一个文人来讲，剃发是儒者尊严的堕落。²³ 著名儒家学者杨廷枢（1595—1647）由于断然拒绝剃发，而英勇就义。²⁴ 这是明末清初复社领袖人物的身份认同：忠于明王朝，与清朝势不两立。

满族统治者清楚地知道，单凭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征服整个中国的，他们不得不仰仗归附的汉人来完成这一使命。同时，这一过程也是在经历了三代或更长的时间才得以完成的。魏斐德用 18 世纪蒋士铨（1725—1784）所创作的戏曲《桂林霜》和当时的一些史料讲述了马氏家族的身份认同的转化：

马氏家族的殉难还激发了百姓的想象力，因为他们总结了天命从一个王朝转向另一个王朝的缓慢而难以驾驭的进程：祖母是一个明朝的忠臣；父亲归顺了满洲；儿子是一个清朝的忠臣。这三代人的经历，也是中华帝国 60 年的历史。²⁵

三藩之乱中广西巡抚马雄镇阖家为清廷殉难的事迹，还原出了马氏家族从明朝的忠臣到忠于清代君王的身份认同的转移：祖父马与进曾是明朝的辽阳训导，1621 年后金进攻辽阳，据说马与进战死在沙场。其妻听到夫君战死的消息后，为了表达对丈夫和明王朝的无限忠诚，带领家眷和女仆 42 人集体自杀。父亲马鸣佩以明诸生的身份归降皇太极。而 60 年后，马雄镇率家人共 38 口殉忠清朝满族王室。

清朝统治的巩固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早期接受汉族的合作者，到入关后遭遇抵抗；任用明朝旧臣和汉族官员来推行一系列的改革。也就是说，“经过入关后对明朝旧制加以沿用和调整的试验阶段，最后造成了一种汉、满两种统治方式的精妙融合物”。²⁶

“通过马氏家族，历史终于回到了原来的位置，而清朝如今已同明朝完全相称了，它不仅取代了明朝的统治，而且能够胜任。”²⁷ 如此也完成了作为异族的清朝统治者拥有统治中国的合法性，汉族士大夫可以堂而皇之拥护乃至忠诚于清廷的过程：

只是在新儒学的忠君思想不再专属于明朝事业而开始与清朝的命运相联之后，清朝政府才能毫无矛盾心理地倡导这种美德，从而实现其自身从一个异族军事政权向一个握有统治天下之“天命”的合法君主转变。这一过程——对清朝的忠逐渐压倒对明朝的忠——最终完成于1673年“三藩之乱”期间。²⁸

建立一个以儒家价值观为根本的文职官僚体制，对于满族贵族势力来讲是一件新鲜事。对于那些驰骋疆场的满族高级将领这一招是非常管用的，现在他们都被掌控于儒家理念的价值观之下了。客观上来讲，原本随时可能产生割据势力的武将集团通过儒家理念而被皇权控制在了手中。

现象与本质以及作为人类共同经验一部分的中国历史

魏斐德特别重视作为反实证主义的哲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 1858—1918）的观点，齐美尔认为“零星的形象”对社会现实至关重要：

对于我们来说美学观察及其解释的本质在于这么一个事实，即典型不应来于独特，必然并非出自偶然，事物的本质和意义在于其意义和瞬息变化之中。任何现象要逃脱具有意义、永恒的本质都是不大可能的。²⁹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魏斐德想从美学和政治的角度出发，“用17世纪文人近乎任性漂泊的生活，为在满人征服中国明朝时期包括浪漫派到禁欲主义者和仁人志士们在内的整个知识分子的阶层构画出一个‘传记轨迹’时”，³⁰齐美尔上述的“零星的形象”成为了他的理论依据。一共十五章的《洪业》，每一章实际上是由多个不同的“零星的形象”构成的。以第十章“危时计拙”为例，在清军占据江南主要中心城市的过程中，魏斐德所钩沉出的“零星的”形象和事件有：“钱谦益与合作的污点”、“土国宝和太湖复明分子”、“溧阳、淮阳起义”、“1646年复明分子的失败”、“陈子龙与松江兵变”、“兜捕文人学士”、“淮安之谋”、“清廷的猜疑”、“复明党希望的复萌与破灭”、“万寿祺和顾炎武”。魏斐德通过把综合性的叙事以及分析性的文字相结合，揭示了这些人物和事件的本质和意义。

对一位美国学者来讲，中国历史研究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魏斐德借用他的老师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 1920—1969）的一段话，揭示出作为他者的中国历史研究的意义所在：

当人们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在没有破坏它的完整和个性下），与对西方历史的理解二者互相强化时，我便看见了一个世界的形成。这两种历史各自互属……因为观察家能够在头脑把其中的问题相互移位（不是移植问题）……还有，中国历史，必须加以研究，因为……这使我们在用以力图理解西方的同一个世界话语里，看出它的意义。³¹

魏斐德认为，如果想要理解西方和世界，理解中国是不可或缺的步骤。实际上对他者的感知交往反映出的不仅仅是他者，同时也反映出自我对他者的想象、建构、阐释的模式。世界史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构成了反思自我、反思历史的一种重要视角。从这个方面来讲，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实际上折射出的是对自我的理解。

魏斐德在谈到他的老师列文森的中国历史研究“革命和世界主义”（1971）的时候，也表达了他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他并不认同文化本质主义者所认为的中国历史完全是一种特立独行的认识。他写道：

事实上，对他（列文森——引者注）来说，近代的压抑是一种“普遍状态”，这也使中国与其周围的世界捆绑在了一起。梁启超这类知识分子的困惑并不意味着将出现一部卓越的民族史，而恰恰表明了中国对一个狭义的世界近代历史的新介入。因此，列文森自己的学术方法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他原先的方法，经常在中国和其他国家间进行平行比较，现在，他有意识地将中国历史作为人类共同经验应有的一部分：“我试图将其他民族的经验与中国的经验联系起来——不是为了一种勉强的相似，不是为了装饰，不是仅仅为了与其他有所‘关联’，也不是想以汇集综合来速成一部世界史，而是作为一个普遍来揭示中国。”³²

魏斐德的中国历史研究，在重视文化的差异性的同时，他也特别强调人类思想、行为方面的普世性特点。跟列文森一样，魏斐德也“有意地将中国历史作为人类共同经验应有的一部分”。

从全球的视角来分析明清的嬗变过程

传统史学认为，统治者的道德堕落会直接导致失去当政王朝的统治权力。同样整个社会秩序制度性的崩溃以及贪污腐败也都在侵蚀着明王朝的政权：党争、厂卫、宦官专政的政治倾轧以及皇帝的不理朝政等等。除了这些因素之外，魏斐德的视野更加宽阔，他将明末清初的中国历史放在了全球史的背景下来看待。除了《洪业》之外，我们可以从魏斐德一系列的相关研究中看出他“考察历史的全球视角”（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past）。这同时是一个纵横交错的阐释理论网络，任何一个单一的原因都显得太简单了。

《洪业》一书展示了魏斐德深厚的史学理论功底。丰富的历史学理论不仅涉及到以往的一些学说，在他的参考书中也有四部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的代表作和两部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 1917—2016）的著作。可见全球史的观念，对于魏斐德来讲并不新鲜。也正因为如此，艾森斯达特认为：“魏斐德将中国研究推向新的领域和方向，提供了分析中国在世界之位置的更为复杂的方法。”³³

在魏斐德的眼中，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从未脱离过全球的发展史，因此并没有一种孤立的、隔绝的中国历史存在。离开了全球的背景，中国历史根本不存在。不论是早期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1—1997）著名的“冲击—回应”理论，还是后来柯文（Paul A. Cohen, 1934—）所谓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在全球史网络“互动”的影响下，他们所强调的显然都是不够的。因此，魏斐德反对任何形式的中心主义，不但是欧洲中心主义，也包括中国中心观，从而重新来理解东西方的关系。在《洪业》一书中，他将明清嬗变的历史进程与全球范围内的17世纪总危机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从整体观和联系观出发来进行分析，从而展现给我们一个具有世界性关联的中国历史。这是将中国内部的历史与全球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有益尝试。这些基本的观点包括：

1. 明末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货币体系中重要的一员。魏斐德认为，自罗马时代以来，中国便是欧洲货币的归宿。³⁴17世纪的时候，东亚形成了自己的世界经济圈，所谓的“eine Welt für sich”，中国处于这一体系的中心，吸取了西班牙美洲所开采银矿的20%之多，这些白银以帆船装载直接穿越太平洋经马尼拉，运送到广州、福建和浙江，换取丝绸与瓷器。其他美洲银锭则通过在布哈拉（Bokhara）的中亚贸易间接到达中国。于是，新大陆开采出来的贵金属有一半来到了中国。将这个数目与日本输出的白银数量相结合，17世纪前30年每年到达中国的钱币总量至少有25万—26.5万公斤，很可能会更多。³⁵正因为如此，魏斐德将明清之变时期的中国历史置于全球性的相互关系情境中来理解和考察。

2. 17世纪全球气候发生了巨大变化。大约在1615—1675年间，全球气温下降了2—3摄氏度。在17世纪30—50年代，全球气温的下降造成了社会的动乱：饥荒、水灾、瘟疫、天花等。从万历三十八年（1610）到顺治七年（1650），中国的人口下降甚至达到了35%。³⁶

魏斐德引用布罗代尔的话说：“大约在同一时期，中国和印度与西方的进步与退化几乎同一节奏，似乎所有的人类都在原初宇宙命运的掌控之中，相比之下，好像人类历史的其他部分都是次要的了。”魏斐德确信，明末清初的中国同样卷入了那场覆盖整个地中海的17世纪的危机之中去了。³⁷

气温的下降造成了瘟疫肆虐，魏斐德在注释中写道：“在1641年瘟疫流行期间，桐乡县（江南嘉兴府）居民十之八九被传染。有些一二十口人的大户，竟无一人幸存。蛆虫爬出户外，邻居不敢下足。”³⁸这种惨状在很多的中国史书中都有记载。

1644年在天花流行的北京，满人相信只要与汉人接触就会染上这种疾病，许多汉人被赶到农村去了。魏斐德解释说，这样的隔离措施还是起了作用的。种族分离。例如清人的那种做法，可以大大降低感染率，